

「概念流動與區域對話」專題引言

李 宥 霆*

周 志 煌**

本刊第17期以「概念流動與區域對話」為專題，所收錄的三篇論文，均各自以其關懷和方法，相當大程度地運用了——甚至也可以說是試驗了——概念考索和歷史研究之間的關係。

梁啟超（1873-1929）在其膾炙人口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，借用佛家術語，以生、住、異、滅四個階段，比喻思潮的啟蒙、全盛、蛻分、衰落四個時期。任公且如此斷言：「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，其變遷發展，多循斯軌。」¹不過，相較於學術思想史所勾勒出的潮起潮落，觀念史則別有關懷，其視整體的潮流趨勢為各個分力之加總，而分力的「向量」（包含方向和力度大小）體現於觀念，至於觀念的落實和運作，則由詞語來擔綱。

在《觀念史研究：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》一書裡，金觀濤與劉青峰為「觀念」下了如此定義：「觀念是指人用某一個（或幾個）關鍵詞所表達的思想。」²兩位的研究發現，自西力東漸以還，儘

* 作者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。

**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¹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收於梁啟超：《飲冰室合集·飲冰室專集之三十四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，頁2。

² 金觀濤、劉青峰：《觀念史研究：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，2008年），頁3。

管中國的思想發展如波濤洶湧，但觀念作為蘊含意義、承載思想的基本單位，大概在 1920 年代以後即趨於穩定；其後的思潮變化，主要是觀念之間彼此相對關係的調整，而不是觀念被賦予的意義有所更迭。

不過，這裡所謂的觀念，主要是透過「科學」、「民主」、「社會」、「個人」、「民族」、「國家」、「世界」、「革命」等等重量級關鍵詞所表達者，他們在往後的歲月中，構成了無論是三民主義或是馬列毛思想的核心，並以其不同的排列、形構方式，造成了各種意識形態的決定性差異。更有甚者，由於這些詞彙均以漢字呈現，帶有傳統中國的思想痕跡，但往往又是由近代日本學者加以擷取、組合，以求與西方概念對應，接著在更大範圍的漢字文化圈內傳播，並由此觸發了接受、反芻甚至反饋等機制，因此，東亞也就成了特別適合進行觀念史與關鍵詞研究的場域，不但有類似的詞彙可供觀察，更可追蹤比較他們在不同脈絡裡的遭遇。這一點已屢經熟悉此道的前輩學者加以確認並示範。

另一方面，觀念史既然是透過語意的生成變化以窺歷史潮流，其與社會的脈動息息相關，而觀念之為物，當然也不限於與上述堂而皇之的意識形態直接掛鉤者，且在中國現當代的基本觀念成形之後，隨著生存經驗和思想領域擴大，也陸續有一些觀念浮上檯面，反映一時風氣。本專題三篇論文所處理的關鍵概念，如「亞洲」、「污染」等，其躍上中國歷史舞台雖然頗早，但主要是在 1920 年代以後因應國際局勢、生活環境的變化而逐漸受到關注；至於「冷戰」，則更是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特殊產物，具有明確的時空特徵。有趣的是，這些觀念除各自表現了重要的思想面向之外，其詞彙的定形、運用，以及所帶動的心理聯想、政治文化氛圍，也溢出了一般東亞的範圍，促使我們在時間與空間軸上，對於觀念史所涉及的「概念流動與區域對話」現象，能有更進一步的省思。

李宥靈的〈試論日、中、印的亞洲主義：以小寺謙吉、孫中山、尼

赫魯為中心)一文,從「亞洲」及其衍生物「亞洲主義」出發,探討20世紀前期三個具有代表性的亞洲國家——獨立自主的日本、作為次殖民地的中國、受到殖民統治的印度——如何圍繞著「亞洲」這個純粹從西方舶來的概念,產生獨特的自我想像,他者認識,乃至於外交策略。該文梳理日本小寺謙吉(1877-1949)於1916年出版的《大亞細亞主義論》、孫中山(1866-1925)於1924年在日本神戶發表的「大亞洲主義」演說,再加上印度尼赫魯(1889-1964)於兩次大戰期間的數種代表性著作,比較日中印三國基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及現實考量,對於「亞洲」這樣一個介於政治與思想、地理與文化、國家與世界之間的近代概念,產生了什麼樣的反應(按「亞細亞」一詞雖古,但其由歐入亞,進而在亞洲的思想圈造成影響,則完全是個近代現象)。

孫中山在《三民主義·民族主義第一講》中曾說:「主義就是一種思想,一種信仰,和一種力量。」³換言之,主義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。當原本作為地理標籤的「亞洲」一詞,在西方稱霸的過程中被注入了文明等級的意涵,而亞洲人在受到歐風美雨侵襲之餘,默認了這樣的等級結構,此時以團結亞洲為號召,意欲凝聚「思想」、「信仰」和「力量」的亞洲主義,也就成為一種反霸權的意識形態。這樣的意識形態,順利成章地是由率先於亞洲完成近代化的日本來推動,其緣起於19世紀末葉,主張聯合亞洲以對抗西方帝國主義。然而,隨著世異時移,部分日本人也逐漸生出「脫亞」之異心,覺得應當揮別惡鄰,與西方列強為伍;即便是在「興亞」的陣營當中,其亞洲主義的核心價值,也往往被置換為皇國中心的大和民族主義,並以提攜亞洲弱小國家為口號,遂其海外擴張的目標。有鑑於此,中國知識人如李大釗(1889-1927)、孫中山等,一方面固然須與日本維持友好,但另一方面也提醒中國人,要慎防日本包藏於亞洲主義之下的野心,甚至就直接對著日本聽眾呼籲,望其能捨「霸道」而就「王道」。

³ 孫文:《三民主義:增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》(臺北:三民書局,2011年),頁1。

事實上，正如同日本的亞洲主義極其複雜，不能一概而論，中國在這個議題上雖然是被動發言，但在孫中山和李大釗兩位意見領袖之間，關於亞洲主義的設想也微有異趣，這既涉及到兩人政治立場的差異，其各自對外交的態度也扮演了關鍵角色。在該文中，作者另將華文世界讀者較不熟悉的印度也納入比較，跟隨著尼赫魯的腳步，揭露印度革命志士對中國與日本的矛盾感情，及其眼中「亞洲」的複雜性格（兼本質性與工具性而有之）。最重要的是，由於印度所面對的是西方殖民母國，與中國遭受東鄰欺壓不可同日而語，因此其各自投射於「亞洲」的願望，就顯得異彩紛呈。總而言之，「亞洲主義」的風行時間雖然主要在 20 世紀前期，但作為一個觀念，其牽涉了關於民族、國家、東方、西方、世界、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等的認知與想像，不僅展現了概念流動與區域對話的能量，也值得未來更深刻地發掘，以供當前國際情勢參考。

Rune Svarverud 所撰的“Genealogy of Chinese Perceptions of ‘Polluted Air’: 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Terminological Landscape of Air Pollution in Modern China”一文，遵循的是較為典型的概念史研究方法，即借用 Reinhart Koselleck 所辨認出的後啟蒙時代之德國所經歷的概念轉化——「時間化」（Temporalization; *Verzeitlichung*）、「民主化」（Democratization; *Demokratisierung*）、「政治化」（Politicization; *Politisierung*）、「意識形態化」（Ideologization; *Ideologisierbarkeit*）——來把握「空氣污染」作為一個伴隨著現代化歷程而愈益顯著的社會現象，其如何引發中國人的健康意識，進入公共言論場域，見證了知識轉型並經歷了詞彙定形的過程。

Svarverud 對於概念「四化」的簡述如下：「時間化」意味著概念受到線性的進化史觀影響，對於過去和未來的關係開啟了不同於前的想像；「民主化」意味著詞彙掙脫菁英壟斷，而為普羅大眾所理解並使用；「政治化」意味著某些觀念成為社會運動甚至階級鬥爭的工具；「意識形態化」則是觀念越趨於抽象且被提升為行動的指導綱領。

Koselleck 認為，1750 到 1850 年這段時期的德國，見證了上述的概念急遽變化的過程，他以「鞍形期」(Saddle Period; *Sattelzeit*) 名之。⁴

依據這樣的理論架構，Svarverud 指出：自 19 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降，中國的知識界便不得不向近代西方的知識系統轉型，而大氣學、衛生學也是其中一環。「氣」雖然是傳統中國思想的核心概念，但是多使用在道德、形上場域，即便是傳統醫學領域所說的「氣」(如「邪氣」、「戾氣」、「穢氣」、「疫氣」、「瘴氣」之類)，仍與現代化學意義的「空氣」相去甚遠，後者要到 19 世紀後期才在中國普及開來。「污染」一詞也有類似的遭遇，其雖於古典有據，然多意指物體染上色彩或指人心的不潔淨，因之道德成分亦濃；一直要到近代，經歷了「玷污」、「污穢」、「污瀆」、「染污」、「弄髒」等詞語變幻後，中國才在日本的影響之下，用「污染」一詞來指稱相當於“pollution”的概念。⁵之後，在 20 世紀的 20 至 70 年代之間，關於空氣、污染、衛生、健康等知識疊合交錯，才凝聚成爲今日所熟知的「空氣污染」以及相關概念。作者論道：這段時期是中國空氣污染概念史上的「鞍形期」，這不只是一個概念和術語標準化的過程，更是知識建構、社會意識轉換的過程；透過這份研究，作者益發堅信，前人所揭櫫的概念史與社會史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。

如果說上述兩篇論文都著眼於特定概念的形、傳播、咀嚼、消化，那麼由陳學然、張志翔所撰的〈文化冷戰：1950-1960 年代美國與香港高校的交流〉一文，則突出了概念的另一個重要作用：其提供了一種壘罩性的思想框架，甚至是政治、社會、文化氛圍，讓活動於其間的人們自覺地採取某些或順從或逆反的行爲模式，而「冷戰」就是這樣一個有趣的概念。

⁴ 作者同時也參考了後來學者對於 Koselleck 理論的修正，詳見內文。另可參閱方維規：〈「鞍形期」與概念史——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〉，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第 1 期 (2011 年 12 月)，頁 85-116。

⁵ 當然，“pollution”之爲今天眾所認知的“pollution”，在英語世界也有一個演變過程，作者在文中略有交代。

香港作為一個殖民都市，又緊挨著中國大陸，自二次大戰結束之後，一直在冷戰的博弈棋局之中扮演重要角色，而美國欲拉攏香港以制中國咽喉，相關的研究也已不在少數。不過，兩位作者指出：現有的研究成果多著眼於大型的戰略規劃，至於美方人員與香港知識社群、在地大專學生的往來情況則著墨不多。有鑑於此，該文爬梳多種史料，試圖重構美方對香港知識社群展開文化戰略的細節，並分成「美國的交流計劃及香港師生的離港考察」、「在地學生課外活動的資助」兩大部分加以細述。

誠如作者所言，這些交流活動大致具有幾個目的。一、讓交流地區服膺於美國的冷戰戰略；二、改變外國青年學生的意識形態；三、透過體制接軌和長期關係的建立，改變地緣政治格局，最終確立起美國的主導地位。然而，就結果來看，美國在香港執行的策略可以說是成敗參半。成功的方面在於，美國所策劃的教育活動，確實讓香港青年認識了美式的現代化成就和民主制度，也讓香港赴美留學的人數快速增加。至於失敗之處，其實就關涉到東亞複雜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情勢，因為 1950 到 1960 年代的香港仍為英國屬地，根據法律規定，外國（當然也包含美國）不得在香港的教育機構公開地從事政治工作，而流亡自中國的人數日眾，也讓香港的政治和思想立場變得多元，加上港人原本就抱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民族主義，又不願意因為親近美國而得罪中共，這些特有的地緣因素，都使得美國的冷戰佈局無法完全稱心如意，由此益加凸顯香港乃至於整個東亞的獨特性格。

兩位學者的論文，一方面從實證的角度呈現了冷戰活動在東亞展開的複雜性，若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，也揭示了「冷戰」作為一個觀念或觀念叢，其擔負起了整合思想的功能，因此也就與社會行動結合起來。這應該就是金觀濤與劉青峰所說的：「我們把『觀念』定義為社會行動的思想元素，它構成了社會行動的目的、價值和自我意識。」⁶

⁶ 金觀濤、劉青峰：〈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〉，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第 1 期（2011 年 12 月），頁 63。

在「冷戰」這個支配性的觀念之下，我們看到了兩組截然對立的關於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意識形態，更深一層來說，還有關於歷史直線進步的近代式想像，甚至是東西方文明的階層性關係，這些都構成 20 世紀後半葉大國進行戰略部署的前提，而明顯受到大國戰略影響的地區，例如香港，則對於上述力量產生了在地化的反應，因而成就了特殊的歷史景觀。

總結來說，「冷戰」、「亞洲」、「空氣污染」等概念，無論就規模、性質、內容而言，其實都難以等量齊觀，然而一旦並置閱讀，我們卻發現概念流動和區域對話的無所不在，而任一概念，竟然都如斯牽動著社會意識、國家政策、外交戰略，實在值得我們嚴肅以待。